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中 华 书 局

I252.2/1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五公大队村史编写组

中 华 书 局

1978年·北京

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五公大队村史编写组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4³/₄印张 94千字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46 定价：0.31元



“老四户”在一起学习



耿长锁同志在劳动休息时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除虫小分队正在喷治虫害



耿长锁同志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



棉花丰收



耿长锁同志和大队技术员鉴定小麦品种



麦收场上忙脱粒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灾难深重的旧五公	3
苦难岁月	3
不屈的斗争	10
第二章 抗日烽火	16
发动群众	16
摆开火阵烧野牛	20
第三章 组织起来	30
“土地合伙组”的诞生	30
在斗争中成长	33
退组风波	38
“咱们坚决不散”	42
第四章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45
砸碎封建铁锁链	45
保卫胜利果实	51
第五章 在斗争中发展的初级社	55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55
和富裕中农竞赛	59
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62
粉碎篡权阴谋	64

	迈出新的一步·····	67
	砍不倒的合作社·····	69
第六章	高级社的诞生·····	77
	一场伟大的变革·····	77
	高级社的优越性·····	83
	关于两条道路的一场大辩论·····	88
第七章	人民公社好·····	93
	革命闯开跃进路·····	93
	欢庆公社成立·····	96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99
	党的基本路线指航向·····	107
	自力更生结硕果·····	112
	在四清运动中·····	11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奏凯歌·····	122
	伟大的革命 战斗的洗礼·····	122
	一个朝气蓬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130
	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135
	一代新人一代新风·····	137
	集体经济飞跃发展·····	141

前 言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公社五公大队，是开放在华北农村的第一枝社会主义之花。一九四三年冬天，五公村以耿长锁同志为代表的四户贫苦农民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办起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合伙组”，开始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金光大道。当时正是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艰苦年代，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办起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合伙组，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正如《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为庆祝五公集体化二十周年而发表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在民主革命阶段办起这样一种具有较多社会主义因素的生产合作社，在个体经济茫茫大海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阵地，这应当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可贵的试验。”

五公人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已经三十四年了。这三十四年，是五公村天地翻覆的三十四年。过去，五公“五沟十岗土质薄，风沙虫旱年年遭”，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子。土地合伙组诞生以来，五公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逐步改变了自己家乡的面貌。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资产阶级司令部，五公更加呈现出一派“莺歌燕午”的大好形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社员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基本

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园田化，在一九七五年遇到少见的旱、虫、病灾的情况下，粮食亩产仍达一千二百八十七斤。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毛主席指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五公村的历史是一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三十四年来，五公人民每前进一步，都曾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其中有地富反坏右的造谣破坏，有城市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的冷嘲热讽，特别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耿长锁同志带领五公广大贫下中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妖风，斗恶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把五公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现在五公人民正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向更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进。

第一章 灾难深重的旧五公

苦难岁月

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河流纵横，沃野千里。饶阳县城就在它的中部，五公村位于县城西南二十五里的地方。

五公村原是滹沱河流经的地方，千百年前，滹沱河改道，给这儿留下一片高凹不平的白沙地。以后，是从各地辗转而来的穷苦人披荆斩棘，用自己的双手把白沙滚滚、蒿草丛生的滹沱河故道开辟成良田，人们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五公村的每一亩土地，每一间房屋，都浸透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五公人民一直处于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魔爪也伸到了冀中平原。它们不仅在这里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掠夺，而且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以传教为名，在冀中一带遍设教堂，为帝国主义搜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情报。那时，五公周围的邹村、高桥、曹庄都有传教士的活动，他们和封建官僚勾结在一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欺压人民。五公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贫穷困苦生活。

长期以来，五公村就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两户李姓地主(北李和南李)霸占着大部分土地,成为欺压五公人民的土皇帝和吸血鬼。早在百年前,北李大地主李天贵,占有一千多亩土地,北李大地主败落以后,南李大地主又成了五公村的一条地头蛇。他们勾结封建官府,有的还捐了个监生的头衔,霸占土地七八百亩。后来南李又分为八家,当地人们把这八户地主叫“八大院”。到抗战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五公村共有土地四千四百七十亩,五户地主富农就霸占了约一千二百亩,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一百零八户贫农只有土地四百七十亩,仅占全村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五。地主富农们利用手中霸占的大量生产资料,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正如当时五公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形容的:“地租象剃刀,租息高又高,苛捐杂税多如毛,穷人终年累断腰。”

五公村贫苦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租额一般都在全年产量的五成以上,多的达到七、八成。有的地主,把只有一口破土井的地当作菜园子租给农民,每年收租十五到二十块大洋,折成粮食就达六百斤到一千斤。除了地租剥削以外,地主还要对农民进行各种变相的盘剥勒索。当时穷人向地主租地都得先送很多礼物,不然就租不上地;就是租上了,到了第二年,地主还要借口土质改良,增加租额。在这层层剥削之下,穷佃户们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苦干一年,交完租子,剩不下几粒粮食,掺上糠菜,顶多吃到来年春天。贫农徐僧一家七口人,有一年租种地主十亩地,这年发了大水,收成很少,地主却逼着按原数交租,徐僧的父亲把打下的粮食全部交上去,还是没有够数。狗地主闯上门来说:“没有粮食就拿地顶!”强迫他

家把仅有的三亩地卖了交租。秋收刚过，徐僧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为了活命，他父母只得忍痛卖了十三岁的妹妹，得了二斗红高粱当盘缠，带着徐僧兄妹四人逃到天津。徐僧在卷烟厂做工，其他人住在破席棚里，每天沿街乞讨。没有几个月，父亲病死了，小妹妹冻死了，大弟弟被国民党抓走。母亲和小弟弟被迫重返家乡，半路上，小弟弟又连饿带病死去了。徐僧一家就因为交不起地租，被地主老财逼得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高利贷是地主阶级勒逼穷人的又一恶毒手段。抗日战争以前，河北是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遇到荒年，五公村地主富农就大量囤积粮食，放债牟利，趁火打劫，对贫苦农民豪夺巧取。他们放出去的债有的月利竟达八分，借一百元，在十个月后就得还一百八十元，还不起，就利上加利。永远还不完的“阎王债”，成为地主套在贫苦农民身上的沉重经济枷锁。

一九二九年，五公村遇上大旱灾。站在村头，一眼望去，一片荒凉，寸草不生。在贫苦农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地主们却认为大发横财的机会到了。他们狞笑着说：“地里不长囤里长；土里不长柜里长。”农民王玉章眼睁睁看着一家老小没吃的，托人向地主借了五十块银元。过了一年，地主来逼债，他被迫卖了几亩地，才把债还上。谁知这一年连饿带病，相继死去四人。王玉章刚刚还过债，那里来钱埋葬亲人呢？只得再借债。想到再借债，王玉章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想起自己卖地还债，想起村里十几户贫苦农民被地主的高利贷逼得倾家荡产。他明知向地主借债是火坑，但也得往里跳，总不能让亲人尸体老停在家里呀！他只得找地主再借二

百元，地主满口答应了。可是王玉章接过钱来一数，却只有一百八十元。他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地主奸诈地说：“谁不知我家的规矩，这叫上交利。”从那以后，这一百八十元，本生利，利滚利，二年以后就变成了一笔三百五十元的要命债。一天，地主来到王玉章家说：“王玉章，借我的钱本息共合三百五十元，该还了吧！”王玉章指着自己的破房子说：“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哪还得起呢？再宽容几天吧！”地主瞪起眼睛，恶狠狠地说：“不行，今天你拿不出钱来，就得估产还债！”硬逼他典当了全部家产。王玉章估产还债后，大儿子逃到东北当童工，剩下老小不能远逃的，只能靠打短工讨饭过活。

地主富农对长工、短工的剥削也是极其残酷的。解放以前，五公村许多贫苦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有五、六十户靠给地富扛长活、打短工为生。扛长活的实际上就是被地主富农套上枷锁的变相农奴，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血汗被榨干为止。长工、短工的工资极低，许多时候甚至是只给“饭”吃，没有工钱。贫农徐庄，从十几岁就给地主扛长活，从地里到家里，一天要干十几小时牛马活，地主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徐庄长到成年，农活样样都会干，但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好庄稼汉，却常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更不用说结婚成家了，直到年老体弱，被地主一脚踢出门外。

地主的租、财主的债，压得农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而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对广大贫苦农民征收无数捐税，百般勒索。抗日战争以前，五公村贫苦农民每人每年交的“国税”、“地方税”、“地亩税”以及各种苛捐杂税，折合粮食要达三十多斤。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官差劳役。有一年，中农李连通

被土匪“绑票”，报告了地主武装“保卫团”。“保卫团”来了两个团丁，离村二里地朝天开了两枪，进村以后就要三十块银元的“子弹费”。李连通问道：“哪要这么多钱？”这两个团丁拿枪逼着李连通说：“不给钱，就跟我们走一趟。”真是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李连通没有办法，只得凑钱交了“子弹费”，不久就气疯了。

毛主席曾经指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旧社会五公村的地主富农，对贫下中农不仅施行残酷经济剥削，而且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迫害。“八大院”之一的地主李化岐，占有一百七十多亩土地。他的哥哥李化南，是个万恶的土匪头，经常聚伙抢劫，奸污妇女，敲诈勒索。李化南同县里司法队长赵玉奇，又是磕头把兄弟。官府衙门和土匪恶霸互相勾结起来，为非作歹，行凶作恶，把五公村闹得暗无天日，阴森恐怖。

贫农李梅馨，有裁缝手艺，李化南叫他做了一件绸衫，不仅不给工钱，反而趁夜偷偷地把在北午村抢来的包袱扔在李梅馨的院子里栽赃。第二天一早，县司法队的狗腿子闯进李梅馨家，硬说李梅馨抢了北午村，把他抓进监狱，酷刑拷打，活活折磨死了。李梅馨的叔伯兄弟李常在，对此非常气愤，他在街上喊道：“这个年头，穷人的日子还有法过吗？”这一句话，闯了大祸。不久，李常在就被司法队抓了起来，惨遭毒打，最后被害得倾家荡产。

还有，贫农李占山的母亲和另一个贫农李祥，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李化岐一伙，也被栽赃抄家。有个贫农的孩子，在村上捋树叶，李化南见了，开枪就打。这些强盗，对贫苦农民的

欺压迫害，真是数不清，说不尽。

一九三五年地主李化岐想当村长，以便直接控制村政权，全村贫苦农民团结一致，粉碎了这个阴谋。李化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挑拨贫苦农民之间的团结，妄图把全村群众控制在他的手里，加强其反动势力。一天，他找到贫农徐敦，百般引诱拉拢，要徐敦在村里为他效劳。徐敦识破李化岐的阴谋，瞪着他说：“谁和你们瞎掺合！”李化岐恼羞成怒，心里暗暗打下鬼主意。秋收过后，徐敦交完了租，家里没吃没烧，孩子饿得直哭，只好把自己园子里的一点谷子割了回来。谷子刚刚推进家里，李化岐就带着县司法队的几个狗腿子闯进来，诬赖徐敦偷了他的庄稼，不容分说就把徐敦捆绑起来，关进监狱。李化岐还得意忘形的说：“穷小子想翻天，一亩地出一个大子儿，就得把徐敦点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孔孟之道是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派从思想上统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那时候，在五公村，地主富农们经常宣扬什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等反动思想毒害人民，借以维护他们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地主豪绅用从劳动人民那里骗取的钱，大搞迷信活动，在村西修了菩萨庙，在村中建起关帝庙，在村东盖了天齐庙、三官庙，村北头建了龙王庙，一个不大的五公村，到处都是乌七八糟的“神庙”，逢年过节和遇上灾荒就让人们来烧香磕头，祈求祷告。神权和政权、族权、夫权，代表着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了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几大绳索。

抗日战争以前，五公村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